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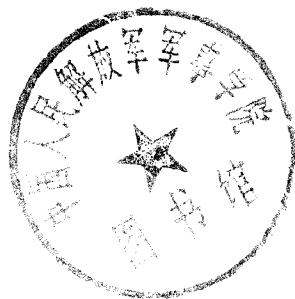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

(译 文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海涛
封面设计 胡朝惠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6.5印张 324千字 1插页
1982年2月第一版 1982年2月贵州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50

书号3115·437 定价 1.30 元

编者说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生于1888年10月10日，1906年十八岁时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1年他从流放地逃亡欧洲，后去美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布哈林回到俄国，不久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是俄共（布）党和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之一，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主编。1938年3月15日被苏联当局处决。

布哈林是苏联早期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他在青年时代就特别爱好经济理论，在流亡国外六年中，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著作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说，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学说以及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写了一些专门著作。列宁称他为“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布哈林写过大量的文章和理论著作，著名的有《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15年）、《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1916年）、《共产主义入门》（又译为《共产主义ABC》）（1919年）、《过渡时期的经济》（1920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1921年）等等。布哈林对于帝国主义理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理论、特别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等，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布哈林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也应当指出，布哈林的理论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列宁曾指出，要把布哈林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

布哈林被处决后，他的著作便无人问津。从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开始，各国学者又重新对布哈林进行深入的研究，重新评价。最早写出的著作有悉尼·海特曼的《尼古拉·布哈林已发表著作注释目录》（科罗拉多、柯林斯堡，1958年），彼得·克尼尔施的《布哈林的经济观点》（柏林自由大学东欧研究所，1959年），亚历山大·厄里奇的《苏联工业化问题的争论（1924——1928）》（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等；到六十——七十年代国外出版了大量的布哈林著作的新版本，各国学者写了大量研究布哈林的著作、文章。1980年6月意大利共产党葛兰西学院在罗马还组织了“关于苏联和国际共运史上的布哈林”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为了解国际上对布哈林思想研究的情况，对布哈林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价，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编辑了这本《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译文集）》。我们编辑的原则是：注意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意促进开展学术研究；注意为科研工作者提供有利于

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的学术资料。为此，我们收集了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持有不同观点的文章，力求能反映出布哈林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貌。

本译文集共收入十九篇文章。其中，关于布哈林生平的四篇，哲学的五篇，政治的一篇，经济的二篇，书评三篇；把布哈林作为右倾反对派来批判的，反映当时苏联的评论和现今官方评论的一篇。

本译文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组织编辑的。主编韩佳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林英（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张伟垣（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王福海（河北师范大学）、秦永立（杭州大学）、赵成文（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参加了编辑工作。参加译文校订的有曾宪森（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田大畏（北京图书馆）、宋益民（北京图书馆）、陈为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同志。

序 言

自从一九三八年布哈林在莫斯科“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审判案中被枪毙以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给布哈林定下了铁案：人民公敌，匪帮暴徒，法西斯奴仆和间谍，谋刺列宁和凶杀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杀人犯，反对党、反对列宁、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反革命阴谋家。于是布哈林贻骂名于全球。长久以来，布哈林要么不再被提起，要么在政治需要的时候，被揪出来当作反面教员加以批判。

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把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提出来研究呢？这里，有以下一些缘故。

先说布哈林的案件。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强调恢复“社会主义法制”，苏联政府为莫斯科审判案（包括布哈林案件）中的一些死者（包括一些主要作证人）恢复了身后名誉，有时还给予他们荣典。这些行动本身就证明了这些死者的案情是不真实的。但是布哈林和李可夫这样著名的人物未能得到平反。一九六一年苏联四位曾和列宁共事的老布尔什维克写信给苏共政治局要求撤销对布哈林的非法判决，恢复布哈林的党籍。一九六二年苏共中央委员彼·波斯别洛夫在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公开宣布，布哈林当然不曾是间谍

和恐怖分子。布哈林的遗孀A.M.拉林娜和他的儿子尤里·拉林（布哈林）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七七年两度向苏联最高党政机关要求给布哈林平反，并恢复他的党籍，长期不得音信。他们于一九七八年写信给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请他参与布哈林的平反运动。英国罗素基金会把这封信的复本，散发给世界著名的学者、共产党人，请求支持。有一百人联合签名要求苏联政府重新审查布哈林案件，给予平反。一九八〇年意大利共产党葛兰西学院组织了“关于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史上的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国际上发起了一场为布哈林平反的世界性运动。世界舆论认为布哈林申张正义，不仅是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问题，而且也是出于道义上和政治上的需要。

再说布哈林的思想。自从布哈林被枪毙，二十五年来，大多数西方学者和所有苏联学者都公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除斯大林的路线外，别无其他可供选择的布尔什维克的方案。我国也是如此。斯大林逝世后，东方和西方的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开始寻求与斯大林主义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其他建设社会主义方案。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东欧各国的改革者试图在斯大林的框子之外，寻找更适当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研究这一类问题时，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想到苏联二十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解释者和理论家布哈林。五十年代，彼得·克尼尔施、英国学者亚历山大·厄里奇（Alexander·Erlich）首先开始研究布哈林，其后，世界各国学者对布哈林的学术上和政治上的

兴趣大为高涨，出版了大量以多种文字印行的布哈林著作的新版本和大量研究布哈林的著作，甚至编写了关于布哈林的剧本和电影脚本。布哈林的思想于是被重新发掘出来进行研究。

这一切情况，由于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在“十年内乱”期间，闭关自守，因而知之甚少。

我们编辑这本《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译文集）》，目的在于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和看法，以便于进行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和批判性的研究。非常有趣的是，在葛兰西学院一九八〇年六月组织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前，有一份意大利的周刊发表文章说，意共想在这次讨论会上把布哈林推崇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先驱。意共葛兰西学院院长罗扎里奥·维拉里在讨论会的开幕词中说：“这种假说纯属误会，我们毫无此意，我们不想为意大利共产党封另一位圣人和保护者。”同样，我们研究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也不想树立什么新的偶像，一如我们反对树立任何偶像；也不想把布哈林思想生搬硬套地用在今天，一如我们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我们要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布哈林和布哈林的著作放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加以研究，对布哈林及其思想作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明，借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决不认为布哈林的思想都是正确无误的，即使其正确的部分仍然很大程度上没有超出苏联一国的经验，因而是有局限性的。然而，对布哈林的研究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开

阔眼界，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和现实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国对布哈林的研究已经开始，国际上对布哈林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布哈林问题的译文集决不会是仅此一本。

苏绍智

1981年7月

目 录

序 言	(1)
布哈林自传	(1)
尼·伊·布哈林	〔苏〕德·彼·马列茨基 (7)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 (29)
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	〔苏〕尼·伊·布哈林 (70)
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访问记	
	〔美〕J. D. 札戈里亚 (73)
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	(102)
1928年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会晤	(147)
布哈林社会学中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实践	
	〔美〕拉斯·维加斯 (171)
技术装备和社会关系	〔匈〕乔治·卢卡奇 (216)
对一种通俗的社会学的尝试的批评性札记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229)
历史唯物主义者布哈林	〔意〕吉诺·皮奥维查纳 (298)
平衡论批判简介	〔日〕岭野修 (303)
布哈林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国家的理论	
	〔美〕斯蒂芬·F·科恩 (312)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经济发展论	〔日〕日向健 (349)

布哈林主义和通向社会主义之路

.....〔美〕斯蒂芬·F·科恩(370)

布哈林《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一书简介

.....〔苏〕德·彼·马列茨基(463)

评布哈林文集《进攻》.....〔苏〕卡皮托诺夫(471)

布哈林传奇——评斯蒂芬·F·科恩的《布哈林和布

尔什维克革命》一书.....〔英〕伊·恩·卡尔(476)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官方评论布哈林和“联共(布)

党内右倾”资料选编.....(492)

布哈林自传*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88年9月27日(俄历)生于莫斯科。父母亲当时都是小学教员。父亲的专业是数学(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理系)。他用通常的知识分子精神教育我，四岁半我就会读能写。在父亲的影响下，我非常热衷于自然史的书籍，凯戈罗多夫、季米里亚捷夫、布雷姆是我喜爱的人物。我狂热地搜集甲虫、蝴蝶的标本，经常养着小鸟，还爱好绘画；同时逐渐对宗教抱嘲讽的态度。我五岁前后父亲任比萨拉比亚省的税务督察员。我们在这里住了四年左右。这段时间的生活在“精神”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贫乏的，无书可读，但总的气氛是迷人的外省边区城市生活的气氛。我和弟弟现在“自由”得多了，摆脱了合理化的教育，“走上了街头”；生活在花园、田野之中，熟悉花园里毒蜘蛛的每一个小洞，培育“人面蛾”，捕捉黄鼠，等等。当时生活中的主要梦想就是获得《欧洲和中亚地区蝴蝶图谱》及达尔文的其他类似著作。然后我们又回到莫斯科，父亲约有两年时间没有工作，我们陷入了极端的贫困。我时常搜集骨头和瓶子，卖两三角比的钱；抱着旧报纸到小铺去换半个铜戈

* 根据悉尼·海特曼编的《尼·伊·布哈林著作目录》，《布哈林自传》发表于1924——1925年。——编者注

比。这时候我进入市立小学二年级学习。还需要指出，我父亲生活得毫无条理，却很懂得俄罗斯文学，在外国文学中，他最欣赏的是海涅。这个时期我简直什么书都读。海涅的诗我能倒背如流。背熟了科齐马·普鲁特科夫的作品。还在完全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遍读了古典作家的作品。作为趣事我可以说一下，在这个年纪我几乎读完了莫里哀的全部作品，以及科尔什的《古代文学史》。这种无系统的阅读（“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时造成了一些怪事。例如我记得，读了一些很不高明的西班牙骑士小说之后，我在西班牙美国战争期间成了西班牙人的热烈拥护者。在科尔什的影响下热衷于古代生活，不免抱着某种鄙视的态度看待现代城市生活。与此同时经常同所谓“市井少年”交往，然而我决不为此感到遗憾。玩“羊拐子”、击木棒、打架等等是这种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大约就在这时候或稍晚些时候，我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危机”，同宗教彻底分手了。顺便说说，表面上这是以相当淘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同那些崇敬圣物的孩子们打赌，从教堂含了“圣体”出来，胜利地把它吐在桌子上。这里也有些趣事。这时候我偶然地看到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著名的《关于反基督者的讲座》，于是我对自已是不是一个反基督者，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因为我从启示录中知道（顺便说一下，我曾因读启示录被学校的神父处以严重警告），反基督者的母亲必定是个荡妇，所以我就去问我的母亲，她是不是个荡妇——我母亲是一个非常聪明、纯朴贞洁、热爱劳动、喜爱孩子、品德高尚的妇女，这自然使得她非常难堪，因为她怎么

也无法理解，我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小学毕业时我是“第一名优等生”，有一年时间没能入中学，然后预习了拉丁语，经过考试，上二年级学习。在中学（莫斯科第一中学）期间几乎全拿五分，虽然从来没花什么力气，从来没用过字典，总是匆匆忙忙地“抄”同学们的“话”，在老师上课前五到十分钟才“准备”功课。在中学四年级或五年级的时候开始组织“小组”、出版“杂志”等等，起先完全是天真无邪的。象常有的那样，我们也经历了写作活动的阶段。然后开始阅读非法著作，接着是组织有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小组“学生组织”，最后终于决定归属马克思主义阵营。研究经济理论起初给我以沉重的感觉：在“崇高和美好”的后面是商品—货币—商品。但是一旦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我感到它那异乎寻常的逻辑严整性。应当说，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特点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觉得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是一团混乱。此外，自由派熟人使我产生激烈反对自由主义的情绪。这时1905年革命到来了，到处举行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等等。当然，所有这一切我们都积极参加了。1906年我正式加入党，开始非法工作。在毕业考试期间我同伊里亚·爱伦堡一起在斯拉德科夫壁纸工厂发动了罢工。考入大学以后，主要是利用大学作为秘密接头地点，或者是在课堂讨论上对某个可敬的自由派教授进行某种理论“袭击”。

1908年我被选入党的莫斯科委员会，1909年又被选入下一届委员会。这时候我对经验批判主义者有某种异端的偏

爱，并且读遍了用俄文出版的所有这方面的书籍。1909年5月23日在莫斯科委员会开会时被捕，后被释放，接着又被捕，然后我被保释。但是1910年当整个党的莫斯科组织被破坏时，我也被捕（这时我在合法机构工作），在监狱中关押了好几个月，被驱逐到奥涅加，为避免被法庭判处苦役（用于我身上的是第一〇二条），于是逃往国外。我在俄国从事党的工作期间一直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即不曾是“召回派”，也不曾是“调和派”）。在国外，开始了我的生活中的新阶段。最初一段时间，我通常是住在工人家中，而整天都在图书馆度过。如果说我在俄国获得了一般知识和关于土地问题的相当专门的知识，那么，毫无疑问国外图书馆给我提供了固定资本。其次，我认识了列宁，他自然给了我巨大的影响。第三，我掌握了数种语言，并获得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知识。在国外也真正开始了我的著述活动（《真理报》上的通讯，《启蒙》杂志上的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第一篇著作——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等）。我到处都竭力实际参加工人运动。在奥地利听了柏姆-巴维克和维塞尔的课，于战争前夕被捕，被驱逐到瑞士；然后历尽艰辛到达瑞典（中途曾在纽卡斯尔被捕），在这里同亲密的朋友皮达可夫一道紧张地在图书馆研读，直到被捕（所谓霍格伦案件）。接着有一段时间住在挪威（直接参加了“青年派”机关刊物《阶级斗争》的出版工作），但不久被迫秘密赴美。在美国任《新世界报》编辑，参加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左翼”，等等。革命后取道日本回俄，因在士兵中间进行鼓动，在车里雅宾斯克被孟什维克逮捕。

抵达莫斯科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委员会委员、《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斯巴达克》杂志编辑。一直站在左翼（还在国外就曾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避免的论点）。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直到现在仍任此职。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以后的整个时期是列宁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超过对任何别的人的。从我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一点来说是这样，从我有幸能和他同在一个队伍，并且他作为一般的同志和人，而我有幸能站在他的身边这一点来说，也是这样。目前我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真理报》编辑以及作家、讲师、党的鼓动员、宣传员等等。

主要理论著作有：1.《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2.《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对所谓“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的批判）；3.《过渡时期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瓦解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改组的基本规律作理论分析的尝试）；4.《历史唯物主义理论》；5.理论论文集《进攻》（反对柏姆-巴维克、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弗兰茨·奥本海默等人）；6.《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为批判罗莎·卢森堡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而对再生产过程、市场和危机理论所作的分析）。通俗小册子中流传得特别广的有：《共产主义入

*《过渡时期经济学》，又译为《过渡时期的经济》——编者注